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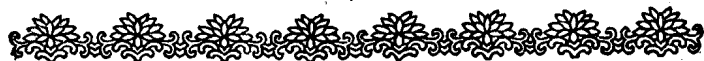
鲁迅作品研究

江苏省文联編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鲁迅作品研究

江苏省文联編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62.02/10

魯迅作品研究

江苏省文联編

*

江苏省書刊出版業許可証出〇〇一號

江 蘇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南 京 湖 南 路 十 一 號

新华書店江苏分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4 1/4 字数 87,000

一九五七年九月第一版

一九五七年九月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27,000

封面設計 胡世德

目 录

魯迅前期杂文的战斗意义·····	朱 彤(1)
論魯迅小說的体裁·····	陈瘦竹(15)
魯迅小說里的知識分子形象·····	黃进德等(30)
划时代的战斗的詩篇——“野草”·····	吳奔星(40)
論魯迅的戏剧体的作品·····	沈蔚德(53)
魯迅的語言艺术·····	朱 彤(61)
論魯迅的文艺批評·····	吳調公(84)
“怀旧”試譯 (附“怀旧”原著) ·····	孙 望(101)
評許杰的反现实主义的“小說論”·····	陈鳴树(127)

魯迅前期杂文的战斗意义

朱 彤

新文学运动从它开始阶段，就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。魯迅在五四时期的杂文，恰好鮮明地显示了这个特色。这里所謂五四时期，是广义的；意思指魯迅发表“随感录”起，至一九二五年止。

在五四时期，革命武装力量还在准备阶段，从思想上动员群众就成为当时极其迫切的革命任务。翻开魯迅的杂文，立刻可以发现一大堆問題，例如儿童問題，妇女問題，文言和白話的問題，科学和迷信的問題，文艺批評問題，国粹和反国粹問題，等等。它們看来似乎互不相关，实际上，却莫不互相牽連，通到一根主干上去，——就是反映革命的要求。譬如，拿教育儿童來說吧，是用封建誡条束縛他們？还是象魯迅所主張的，放他們到寬广光明的地方去？这就显出不革命和革命的分野。关于妇女解放的看法，是把她們拘留在厨房里，或者仅仅給她們职业，給她們所謂“經濟权”，讓她們能够买一条好看的圍巾？还是率直向她們指出：妇女彻底的解放，必須根本变革經濟制度？魯迅的答复是后者；无疑的，它笔直通向革命的道路。对待其他問題的看法，同样可以透露論者的政治态度。站在不革命或反革命的立場上，不管是自觉或不自觉的，归根到

底，总不免叫人不要动，或者叫人做做样子，在旧制度所允許的範圍內輕步慢移。站在拥护革命的立場上，情形就恰恰相反了。在魯迅，他总是把形形色色的問題抓过来，放在革命的亮光下照耀它們；放在彻底摧毁旧制度的要求下，联系被奴役被压迫的血腥现实，从多方面运用多样的文艺手法，生动地和鋒利无比地揭露“不要动”或“慢慢动”的嘴臉，揭露他們对于广大人民的危害性，从而发出热情洋溢的革命召唤。在这个意义上就摧毁旧社会的总的革命方向說，可以这么講，他的前期杂文正是动員群众最有力的武器。

在旧中国，封建主义的老根是那么蜿蜒深固；帝国主义的角逐是那么操切激烈，自海通以来逐漸形成的买办洋奴思想和市儈风气，象晚清的譴責小說所反映的，又是那么严重；而以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运动，根本不同于資產阶级的革命，它不但跟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彻底决裂，而且最后还要消灭一切剝削阶级。这就規定了战綫的广闊性和战斗的尖銳性。并且，社会主义所代表的正义和光明，往往使得抹着人油的嘴巴难于辯解，不得不躲躲閃閃地誑騙，这就又規定了思想斗争的复杂性。魯迅所面对着的，正是这样的局势。在“这样的战士”里，魯迅概括地告訴我們，他曾經遭遇到各样反动阶层的代言人，头上綉着各种“好花样”：“学問”呀，“道德”呀，“国粹”，“民意”呀，“邏輯”呀，“公义”呀，“东方文明”呀，……。魯迅所要担負的，就是投入这样广泛的、复杂的，而又巧妙隱蔽着的思想斗争。正是由于战斗的艰巨，由于历史条件所規定的斗争任务的沉重和迫切，而魯迅的战斗意志又是那么无比的坚韧和熾

烈，这就使得他的前期杂文显出分外的犀利，显出丰富多彩的內容和巨大的思想深度和广度。

必須指出，尽管如馮雪峰同志指出的，魯迅从匕首式的杂文拓展了非常廣闊的战綫，但这决不意味着，他对任何战役都是平均使用力量。用不着說，魯迅对于一切战役都是严肃的，只要他嗖的掣出“匕首”来，那“匕首”的寒光也总是致命的。魯迅当然也曾直接打击了反动統治者和帝国主义。但是，在五四时期，当革命还在思想动員的准备阶段，魯迅就不能不以其閃閃的目光，警惕地監視着那些重大的、最足以蒙蔽人民群众的反革命宣傳，从而集中力量扑灭它們。我們往往重复一再重复的論点，例如說，魯迅前期的杂文是彻底反帝反封建啦，是猛烈地打击一切敌人啦，等等。話都不錯，但反帝反封建是总的革命任务，——历时好几十年的总任务；而革命现实却是发展的，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有它独特的战斗要求和特色，各个革命作家也有他不同的經歷和遭遇。問題在于，在特定的历史阶段，在特定的革命要求下，魯迅是通过哪些主要斗争来进行彻底反帝反封建的？这些斗争的性質又是怎样？

如前所說，在五四时期，对于思想家和作家說来，革命特定的要求就是聚集力量加速动員群众的工作。因此，打击那些严重妨碍革命思想动員的反动活动，便是魯迅所处的那个历史阶段的重大战斗。在魯迅看来，当时有三种反动活动，显著地麻痹着人民，造成革命动員的困难。例如，他曾这么說，中国人民革命的希望，“会勾消在許多自詡古文明者流的笔上，淹死在許多誣告新文明者流的嘴上，扑灭在許多假冒新文明

者流的言动上。”这就勾出了他前期杂文主要斗争的对象，乃是披着“文明”外衣的统治阶层的代言人。

所谓“自诩古文明者流”是谁呢？就是国粹派：包括林紓，严复、“学衡”和“甲寅”所代表的反动势力。如所周知，首先跳出来反对新文化运动的，是林紓。他的荒谬的论文和小说在一九一九年三、四月间，激起了几乎遍及全国的反对浪潮（一）。严复也跟着发表一连串“与熊纯如书札节抄”，诋毁文学革命。至于“学衡”和“甲寅”，人人都知道，它们是维护封建文化的小集团。但这一批“者流”们，只是反对白话文么？或者，只是反对文学革命么？不是的！他们根本的目的，是要阻遏革命，是想抵擋社会主义思潮。林紓在“爱国童子达旨”里，便谆谆“泣告”参加政治活动的青年们，人人应该“自任其实业”；如果“高言革命”，那就“哀哉哀哉”了。严复早在“‘群学肆言’序”里诽谤了社会主义。在五四运动爆发后，他又断言：“他日中国果存”，“亦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”，“决不在今日之新机”。为了抵制革命的洪流，他竟祈望“汉光武唐太宗”出世，“即不然，曹操亦所欢迎（二）。”作为“学衡派”的骨干分子，梅光迪连续发表好

（一）北京“晨报”，上海的“每周评论”猛烈地评击了林紓。此外，参加反林战役的，还有“国民公报”、“顺天时报”、“民治日报”、“民福报”、“益世报”、“时事新报”、“民国日报”、“神州日报”、“浙江教育周报”等等。

（二）“与熊纯如书札节抄”五八——五九页。又，可参看周振甫“严复思想述评”二九四页

几篇文章，例如“評提倡新文化运动者”，“評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”，“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”等等，竭力誣蔑革命，誣蔑馬克思主义。他甚至那样彻底地反动，居然要“逆流而行，与举世为敌”。远在主編“前甲寅”时期，章士釗就揭露了自己的反馬克思主义的立場（一）。大家都很清楚，五四运动以后，他完全倒在北洋軍閥的一边。显然可見，这些“自詡古文明者流”，全是插着“国粹”的旗子来反对革命的。他們滿嘴不离“三綱五常”，不离“孔子之教化”，大有“挽狂瀾于既倒”的神气。这就鮮明地揭露了他們的身分，——沒落的封建階級的代言人。

被魯迅列入第二批斗争对象的，是“誣告新文明者流”。誣告些什么呢，誣告新文化运动走錯了路，錯在提倡科学，錯在拥护“賽先生”。这批誣告者的代表人，就是梁启超、張君勱和梁漱溟。人們不会忘記，在五四时期，曾經发生所謂“科学与人生觀”的論战。这論战其实是他們策动的。事情可以追溯到一九二〇年。当时，梁启超周游列国归来，連續在北京晨报发表“欧游心影录”，大肆宣揚“物質文明”的“破产”，主張中国人“立正，开步走”，走去拯救“哀哀欲絕”的世界。拿什么拯救呢，就拿“精神文明”。張君勱也跟着兜售柏格遜，兜售所謂“直觉論”，資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腐朽唯心哲学，被他看作“精神文明”的理論基础。于是他鼓吹所謂“中西人心之冥合”，提倡所謂“新宋学之复活”，認為是打倒賽先生的法宝。梁漱溟写了一本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”，和梁启超的步調一致，他

（一）章士釗“甲寅存稿”上卷九六——一四〇頁，三九八頁。

也“很可憐”“西洋人”，“可憐”他們“物質的疲蔽”，需要“精神的恢復”，因此，結論是，應該導他們于東方文明這條路來。跟國粹派不同，精神文明論者並不反對白話文，他們自己就運用白話寫作，但都激昂慷慨地反對“科學”。老實講，他們所反對的根本東西，還是革命運動，還是社會主義日益壯大的思潮。按照他們的荒謬邏輯，科學會導致物質文明的破產；物質文明的破產，會爆發社會主義革命。因此，在他們大嚷“精神文明”的同時，梁啟超就宣稱，如果把馬克思主義運用到中國來，他“頭一個就反對”。梁漱溟也斷言：“俄國共產黨發明的路”，在中國是“走不通”的。張君勱在“再論人生觀與科學并答丁在君”的信中，交代得清清楚楚：當五四運動爆發的時候，他和梁啟超同在巴黎，震駭之余，便趕緊請教柏格遜。為什麼呢？就為了“激于國內思潮之變”！顯然可見，他們搬弄赤裸裸的唯心主義，並不是為學術而學術，而是妄想抵制唯物主義，從而抵制中國人民迫切要求的革命運動，他們的思想實質，雖然還是封建主義的，但卻努力使它“近代化”，就是說，他們善于利用近代資本主義的唯心哲學把它打扮起來：什麼“玄學”呀！“美感”呀，“創化論”呀，一古腦兒貼在所謂“東方文明”的理論根據上。因此，他們可以看做資產階級化了的地主階級代言人。也正因为這樣，他們的思想，往往能從帝國主義分子和外國唯心哲學家那里獲得共鳴（一）。

胡適和他率領的“現代評論”派，無疑的，就是魯迅所列入的第三批對象，——所謂“假冒新文明者流”。緊在五四以後，胡適一面冒充“文學革命”的“發難”者，一面到處販賣實証主

义，并透过“实证主义”，贩卖“一点一滴的”改良主义，贩卖“红楼梦考证”，贩卖“国学运动”，贩卖“踱进研究室”的主张，直到他和现代评论派伙同一气，打击学生运动。他这一系列的“言动”，正如胡适自己所暴露的，都是为了一个目的：为了反对革命，反对中国人民跟着马克思列宁走。他们的身份，大家都很清楚，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言人。

当然，这三批对象中，也有人逐渐醒悟，要求进步，毅然走到人民这边来。并且象林纾、严复、梁启超他们，在十九世纪末叶，还曾寻找过真理的道路，建立过一定的历史功迹。对于他们的功迹，中国人民是肯定的，不会忘记的。当然，这也用不着说，中国古代的文化是灿烂的，确实具有世界意义，值得我们自豪。中国的美术吸引了达芬奇，也显著地影响了许多著名的法国画家。老子和孔子尽管有他们的历史局限性，但

(一)当时，帝国主义分子和外国哲学家，正在有意或无意地扩散着所谓“东方文明”的毒素。在德国，就有宗白华先生告诉我们的“景慕东方文明的教授”。参看“流云小诗”后记和“三叶集”通讯。在日本，有鹤见祐辅，说是“支那的生活美”可以“征服”西方。参看“灯下漫笔”。在英国，有唯心哲学家罗素，认为“全世界的国家都象中国一样，这世界就比现在快乐得多了”。参看“怀疑论集”里的“东方和西方的快乐的理想”。在中国，受到这种影响，也起来响应梁启超们的论调的，还有很多人。例如王国维，朱谦之，徐志摩等等都是。参看朱谦之的“无元主义与教育”，徐志摩的“泰山日出”诗篇。至于王国维的意见，参看郭湛波“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”七五——七六页

仍然是偉大的思想家。中国的建筑——特别是园林構造的艺术魅力，在十八世紀，风靡了整个西方。詩經、傳奇和元曲曾經贏得席勒和歌德的傾心。我們一点也沒有理由妄自菲薄。可是，必須說明，尊重祖国的文化跟推銷“三綱五常”的国粹主义，跟麻痹人民的“精神文明”，跟出售“实証主义”的“国学运动”，毕竟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。問題还不仅仅在于，他們利用中国人民的自豪感，作为宣傳各色各样唯心思想的凭籍；問題更严重的是，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，当工人階級剛剛形成自己的政党，当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号召开始激动着人民群众，而人民群众在深重压迫中还有待于进一步动員的时候，他們确在替垂死的买办封建的統治尽着挽救的任务。他們散布的反动言論，套在漂亮的“学术”外衣里，戴着“重視”祖国文化的高帽子，唱着委婉的“改良”的歌曲，也确实起着阻碍革命动員的作用。特别是，他們的活動已經不限于个人一时一地的言論，而是形成了此唱彼和的反动思潮，有着自己的宣傳刊物和陣地，危害性就更其严重。这样，魯迅不能不揮动他的思想利劍，投入了激烈的战斗！

关于林紓、严复之流的“垂老派”，魯迅指出，“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”，“一群老头子”立刻“丧魂落魄”，赶紧“抬出祖宗來說法”了。在魯迅嘲諷的笔触下，他們維護“国故”的“热誠”，实在远比不上“古董商”高明。古董商不过誇耀自己的貨色，并不痛罵“农夫、工匠之类”，他們却要把整个中国打扮成“一个大古董”。在另一篇杂文里，魯迅索性管他們叫做“旧有的古磚”，他們本身已是“古迹”。至于抬出“西儒”鼓吹的国

粹的“学衡派”，那就仿佛是“补添的新磚”。很显然，对于“新磚”，鲁迅是更为不敬的，認為不过是“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”，就連“古董”的价值也談不上了。尽人皆知，章士釗更是他屡次誅伐的对象。鲁迅特別憎恨他对于“过激派”的无耻誣蔑，指出他是“撒謊造謠，蝇营狗苟”！总之，在鲁迅看来，不管老古董也好，假古董也好，目的是一样：就是“都在建造‘活埋庵’”。“滿車的‘祖傳’、‘老例’、‘国粹’等等”，“都想来堆在道路上，將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。”很清楚，鲁迅显然是从革命的角度上、从广大人民要求生活和生存的角度上来駁斥他們，控告他們对于革命的危害性。这些跟国粹派斗争的光輝文字，遍布在“墳”以后的杂感集里，其中突出重要的，可以举出“論雷峰塔的倒掉”、“長城”、“估‘学衡’”、“十四年的讀經”、“未有天才之前”、“华盖集”的“通訊”、“答K、S君”“忽然想到之六”等等。

用不着說，鲁迅同样洋溢着革命的感情，充滿着对于广大人民的热爱，辛辣地鞭打了精神文明論者。就在“欧游心影录”开始发表的第二年，一九二一年，在“智識即罪惡”里，鲁迅就旺盛地嘲笑了所謂“科学破产”的无稽。科学破产了，提倡什么“直觉”呀，什么“感情”呀。請問：你們的用意是什么呀？鲁迅一針見血地戳穿：用意就是要愚弄人民，要害他們象“猪羊”一样，“滿臉呆气，終生糊涂”，以便“保持現狀”，“專以卖肉見長”。結果呢，“直觉論”的說客們倒是“龙顏很胖”，胖得象“大富翁”一样。在“春末閑談”里，鲁迅用着十分逼真的比喻，把他們比做“細腰蜂”，尾巴上長着“神奇的毒針”，專来螫刺人

民的“神經球”。他們是“最殘忍的凶手”，殘忍到了那样的程度，会把活生生的虐杀化为“美談”。啊呀！现实苦难算什么！中国的“精神文明”冠于全球呢。你总該“飄飄然”了罢？于是在“飄飄然”中，“君子劳心，小人劳力”的吃人制度，就能安稳地維持下去。但魯迅憤怒地警告着：这是不可能的，就是“无头也会仍有猛志！”在“灯下漫笔”里，魯迅更指出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都要我們做奴隶，并且要我們做得很开心，很滿足，彷彿自己真是精神胜利了一样。关于这一类抨击“精神文明論”者的文字，还可參看“論照相之类”，“看鏡有感”，“忽然想到——四”，“論辯的魂灵”，“烽話五則”，“我來說‘持中’的真相”等等：它們構成魯迅前期杂文另一組战斗的篇章。

說到第三批斗争的对象，以胡适为首的“假冒新文明者流”，魯迅不但在左联时期，而且就在五四时期，已经开始予以歼灭性的揭露。当他参加“新青年”編輯會議的时候，就对这个披着改良主义外衣的敌人，“不免要側着头想一想。”从此以后，胡适有什么荒謬的言論，魯迅总是大步跨过去，給他一記响亮的嘴巴。胡适說，文学革命的唯一宗旨是“國語的文学”。魯迅表示：“我想，現在的办法，首先还得用……‘思想革命’，还是这一句話。……我以为除此沒有別的法”。从形式主义出发，胡适惡毒地把白話文看作新文学的灵魂；魯迅就嘲笑道：象“快活”、“礼拜六”这些风起云涌的書报”，不是采用了“通妥的白話”么？胡适大肆宣揚“一点一滴的改良”，魯迅說什么呢？他說：“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”！他呼喚“冲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的闖將”，“創造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

代”！和胡适相反，魯迅認為旧中国那輛“破車”，是不能“扶”的，只能“翻后再抬”。胡适裝模作样要“踱进研究室”；魯迅厉声警告道：这全是“一种圈套”！胡适大搞“国学运动”，大开“国学書目”；为了打击他的阴谋，魯迅力劝青年“勿讀古書”。胡适冒充青年的“导师”，魯迅就把他描繪成为“說佛法的和尚”，“卖仙藥的道士”，“將來都与‘白骨’是‘一丘之貉’”。“問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，寻什么烏烟瘴气的烏导师”！魯迅忍不住宣泄了自己的憤怒。对于胡适从隱蔽的敌人走向公开叛离的事实，魯迅是那样投以輕蔑的嘲笑：“只有記性坏的，适者生存，还能欣然活着，但我們究竟还有一点記憶，回想起来，怎样的‘今是昨非’呵，怎样的‘口是心非’呵”！魯迅很早就給胡适之流作出鉴定。他是什么样的貨色呀？是“脖子上”挂着“小鈴鐸”的“山羊”，“走在—群胡羊的前面”，“能領了群众稳妥平靜的走去”，——走到軍閥的屠宰場去。十分明白，从魯迅跟改良主义的战斗中，同样充分地反映了他的革命要求，——那种熾烈的、从根本上摧毀旧制度的要求；同样可以听到他不断动员群众寻觅生路的革命呼喊。所有这些，構成他前期杂文第三組重要的内容，包括“古書与白話”，“渡河与引路”，“青年必讀書”，“导师”，“一点比喻”，“論睜了眼”，“这个与那个”，“碎話”等等光芒四射的篇章。

当然，这三組文字并不是彼此孤立的；恰恰相反，它們常常是互相滲透互相补充的。这是因为，尽管三批斗争的对象各自頂着不同的招牌，但从革命的角度看来，归根到底，贩卖的貨色还是一回事：不是这样就是那样繞着弯子維護封建主

义和帝国主义的統治；不是这样就是那样繞着弯子来反对革命。在“这样的战士”里，魯迅就犀利地戳破那些招牌的虛伪性，指出它們都是“无物之庫”。在另一篇杂文里，魯迅又管他們叫做“做戏的虛无党”。戏目虽不相同，內容却是相同的，——“虛无”；而且，表情也是公式化的，——常常裝成“慈善家”的模样。胡适不是在替学生运动“悲觀”么？林紓不是“泣告”青年么？梁启超也似乎很憐憫那些“哀哀欲絕”的“西洋人”。一切沒落和反动階級的代言人总不能不裝腔作势。但無論怎样做戏，也总瞒不过魯迅炯炯如电的目光；——那种从革命感情深处射出来的目光：你們看看那些“慈善家”！看看他們擦眼睛的手巾是不是抹上“生姜水”、“辣椒汁”！……魯迅常常把他們的共同特点概括起来，給他們拍攝集体照。

就这样，当武裝斗争还在准备的历史阶段，作为一个偉大的革命者和作家，魯迅出色地担負了以推翻旧社会为目的的革命思想动員的任务。魯迅前期的創作，特别是他的杂文，異常鮮明地显出这样的特征，就是，他用一切办法来撕掉紳士的假面具，从而摧毁那障碍群众觉悟的道路，不管这些紳士們是属于日趋沒落的封建統治階層的，或者属于資產階級化的地主們的，或者属于买办資產階級陣營的。在評論蕭伯納的創作特点时，魯迅曾經拿易卜生与之比較，写道：

紳士淑女們是頂愛面子的人种。易卜生虽然揭露一点隱蔽，却从容地說道：“想一想吧”，究竟还留着搖搖擺擺的退走的“余裕”。蕭可不一样了。他使他們登場，撕掉假面具，闊衣裝，終于拉住耳朵，指給大家道：“看啦，这是蛆虫！”連磋商的工夫掩飾的法子也不

給人有一點，能笑的就只有并無他所指摘的痛罵的下等人。……
在這裡，蕭是和下等人相近的，而也就和上等人相遠。……

魯迅前期的思想，尽管和蕭伯納有很大的不同，但以紳士為主要鬥爭的對象，而揭穿紳士的面子不使有退走的“余裕”，倒也正是魯迅自己的戰鬥特色。這就說明，魯迅是和“下等人”相近的，和“上等人”相遠。況且，他還明明知道，他所告發的“上等人”，都是社會主義的敵人。自一九一八年他寫“隨感錄五十六起，到一九二五年發表論‘他媽的！’”止，他曾一再興奮地指出，“閹人的天下一時總怕難得太平了。”又告訴我們，十月革命不但嚇了“官員們”，使他們着忙；而且也“駭死”“中國的閹人、名人、高人”。於是“防華工”咧，防“赤化”咧，慌亂地嚷做一團。是在這樣具體的歷史現實底下，魯迅英勇絕倫地投入了戰鬥，為着動員群眾而致力撲滅反社會主義的宣傳活動。很顯然，魯迅的鬥爭所產生的意義，在客觀上，不能不是保卫了革命的方向。

如果改變一個角度，我們同樣可以說明，魯迅前期的戰鬥是和革命的總的方向一致的。魯迅所鬥爭的三批對象，也恰恰是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和黨機關報所鞭打的敵人。關於胡適的“問題與主義”的荒謬議論，李大釗曾屢次給以抨擊，明白指出他是要“防俄國布尔扎維主義的潮流”。關於胡適的“國學運動”，黨機關報“前鋒”就戳穿它的反蘇意圖。關於胡適的改良主義，虹采在“先驅”上也曾加以嚴厲地撻伐，揭發他迷惑青年阻礙革命的罪行。瞿秋白陳獨秀不止一次地和精神文明論者戰鬥。瞿秋白甚至這樣痛切地罵道：“他們提倡那些禍國殃